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我军在敌后战场上的重要指挥中枢

■李梦蝶 周 一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在晋冀豫地区就有一定的工作基础。1936年,我党和山西军阀阎锡山建立了特殊的统战关系,并以此为契机向山西当地的进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派遣大批共产党员,使其成为由我党实际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抗战全面爆发后,牺牲救国同盟会快速发展,人员逐渐遍布山西各地,为我党在这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提供重要保障。

1937年10月中旬,八路军第129师奉命挺进太行,与已在此地工作的中共晋中特委、正太特委和正太铁委建立了联系,并依托广泛分布的民间团体、组织工人、农民、进步青年等建立游击队,增强该地区的武装力量。至1938年4月,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在西起同蒲路、北到正太路、东至平汉路、南达黄河北岸的广大地区内全面展开。

为便于了解敌我情况,更好筹划指挥作战,八路军总部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境内派出前进指挥所,由时任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具体负责。自此,这个前出的“八路军总部”辗转于山西潞城、武乡、辽县(今左权)等地,成为我军在敌后战场上的重要指挥中枢。

八路军司令部:善谋打仗的“中军帐”

司令部是一支军队内部专司打仗的职能机关,在筹划酝酿、起草方案、组织协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八路军各部挺进敌后,驻地比较分散,敌情威胁多有不同,这就对八路军司令部的业务水准提出较高要求。

当时,在前指负责司令部具体工作的是副参谋长左权。从个人履历来看,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又前往苏联进修,回国之后多次参与我军重大行动的组织筹划工作,对司令部建设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解。上任之初,他主持起草了八路军各级司令部的暂行工作条例,使这一成立不久的重要机关迅速步入发展正轨。

1940年7月底,为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决心发起以破坏敌人交通线为主要任务的一场较大规模战役,也就是后来的百团大战。这场战役在设计之初,计划动用兵力超过20个团,作战单位涉及冀中军区部队和第120师、第129师的部分主力。同时,计划攻击的敌人交通线范围东起河北石家庄、西至山西榆次,几乎覆盖正太路全线,是八路军自全面抗战以来发动的最大一场战役。

在战斗打响后,由于有众多地方部队和民兵武装积极参战,实际参与作战的团一级建制单位多达100余个,由此带来的指挥协同工作量陡增数倍,这无疑是我军司令部面临的一个重大挑



八路军第129师向太行山区进军。资料照片

战。在此情况下,司令部依然保持高效运转,组织协调恰当有序,使战场上众多单位各司其职、目标明确,并组织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作战,不断扩大战果,给敌人造成较大杀伤,极大提振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士气。

黄崖洞兵工厂:“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取得的光辉战绩,振奋了军民士气,也让国民党军心存忌惮。为削弱八路军的实力,蒋介石不顾抗战大局,公然下令从1941年11月起停发八路军的经费,并对抗日根据地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甚至要求“不准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根据地军民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更严重的是,随着八路军的不断壮大,对武器装备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在国民政府停供、战场缴获又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八路军必须紧前实施武器装备自我生产、自给自足,为遂行作战任务奠定物质基础。

经过实地勘察,负责选定厂址的侦察人员发现,在黎城、辽县交界处的黄崖洞虽然地处崇山之中,但内部有一片较大的谷地和充沛水源,适合建厂。在报请八路军总部批准之后,黄崖洞兵工厂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武器装备生产基地。

为解决制造枪炮钢材不足的问题,

兵工厂积极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大家想到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拆下敌人交通线上的铁轨制造枪炮。一来,铁轨的各项技术指标比较统一、稳定,用来制造武器绰绰有余;二来,拆铁轨的同时也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间接支援了部队作战,可减轻反“扫荡”的压力。随着兵工厂不断扩建,工人总数也增至数千人,每年生产的步枪、手榴弹、炮弹等武器可以装备十几个团,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八路军缺枪少炮的困境,被朱德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内外协同配合:打破敌军的疯狂“扫荡”

八路军总部前指长期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一带活动,引起侵华日军仇视,其先后多次进攻我总部机关所在地,但都未能得逞。1942年5月中旬,日军再次集结重兵,发动所谓“C号作战计划”,企图以“捕捉奇袭”方式对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第129师机关等重要目标进行“扫荡”。

在探明日军来意之后,彭德怀、左权等人连日召开作战会议,筹划对策。经研究,总部领导一致认为,从局部上

看,八路军总部是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中,情势危急;但从全局上看,太行地区的众多抗日根据地如晋冀豫、晋绥、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等处,已经将此地日伪军团团包围,使其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只要抓住机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支援作用,从敌军防御薄弱之处突围,八路军总部就可以继续指挥作战,发挥其重要的前指核心作用。

在战前,根据地军民对前一阶段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进一步加强战备工作,尤其是对紧急动员、轻装、宿营等内容进行训练,在总体上提升了根据地灵活应对“扫荡”的能力。各分区组织民兵武装,在敌人可能进犯的道路上设置众多秘密哨所,第129师主力部队则在总部统一部署下,做好转入外线作战的准备。

1942年5月14日,日军率先对太岳南部地区发动进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及时撤出原驻地,转向外线破坏敌人的公路交通线,对其后勤补给线路造成威胁。5月30日,日军1支辐重队伍由黎城出发开往辽县,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一部在部分民兵配合下,在苏亨镇对其进行伏击,以负伤1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40余人。与此同时,八路军第129师各部趁敌人出动“扫荡”、后方空虚之机,积极向敌占区进攻。5月31日,新编第1旅突袭长治机场,烧毁敌机3架;第385旅一部乘虚攻入五阳、黄碾等敌军据点,给敌人造成打击的同时减轻了内线反“扫荡”的压力。

在内外两线、军地双方的协同之下,八路军总部及时突围,保留了大部分有生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继续发挥指挥中枢作用。令人悲痛的是,左权在5月25日的十字岭战斗中壮烈牺牲。他是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挺进敌后建立的第一批根据地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华北地区的抗战形势,并逐步成为太行地区军民开展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作为主力部队的第129师,仅在1937年11月到1938年10月的时间里,就从出师之初的3个步兵团和教导团,发展到主力13个团、基干武装近3万人的作战力量。更重要的是,长期转战此地的八路军总部前指机关,坚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并着手建立兵工厂、报社、学校等其他单位,使该地区的抗战实力得到极大充实,也为下一步合并组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



战国时期的彩绘龙凤纹漆盾。

资料照片

盾与甲冑一样,是中国历史上各朝代都大规模列装的防御类兵器。与需要全身披挂的甲冑不同,盾只需单手把握,灵活挡于身前即可发挥防护作用。盾自诞生以来,便在战场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士兵生命安全的重要保障。在中国古代,盾有多种称谓,如干、牌、盾牌、彭排、旁牌等。本文对称谓不进行绝对性区分,按照习惯性称谓讲述。

盾的构造相对简单,一般由起到格挡防护作用的盾面和固定于盾后侧的把手两部分组成。从外形看,盾主要有方形、梯形和圆形等形制。由于盾的防护面积和体积较大,若完全采用金属材料会过于沉重,不利于携带和作战使用。

铁壁凝霜御敌兵

——中国古代卫体兵器之盾(上篇)

■曹 波

因此,以木、皮革、藤等为主要材料,复合金属部件以增强防护性能,是制作盾时普遍采用的方式。实战中,士兵不仅可藏身盾后躲避箭矢、刀剑、矛戟等各类兵器的攻击,还能以盾挤推敌人创造杀机。《史记》有载,在楚汉相争的鸿门宴上,守候在帐外的樊哙闻知帐内事态紧急,“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樊哙的用法便是后者。

盾的使用历史久远,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出现。当时的盾由藤条、木条和兽皮简单编缀而成,制作工艺简陋,但仍有一定的防御作用。至商朝时期,盾的制作工艺有了较大进步。安阳殷墟曾出土商朝时期的盾,其形制为上窄下宽的梯形,盾面微凸,高度不超过1米,宽度60至80厘米,盾体以木框为支撑结构,表面覆盖多层织物和皮革,并使用了涂漆工艺。这种涂漆工艺不仅可以防腐,还能绘制醒目的盾饰。随着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的不断发展,青铜被应用于盾饰中,青铜盾饰的图案多为狰狞的兽面或人面,对敌起到一定威慑作用。西周时期,盾的分类进一步细化。当时步兵使用狭长步盾,便于组成连锁防御屏障,既能有效抵挡箭矢,又能维持战阵队形;车兵配备的则是窄短盾,更适应车

战的灵活需求。该时期还出现了以犀牛皮制作的皮盾,其坚固程度远超普通木盾。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征战频繁,推动盾的持续发展,演变出步盾、车盾、藩盾、舞盾等多种形制。战国时期盛行用于近战的双弧形方盾。其外形是在盾的正面中央设有一条凸起的纵向中线,中线两侧的上部盾面呈现双弧造型。这种结构设计相比传统的平面盾,能更有效分散和化解敌方兵器正面刺击的冲击力。在制作工艺方面,该型盾不仅采用多层皮革蒙面,还在关键部位加装金属钉、局部金属护面等金属装饰。这些金属构件增强了盾体的整体强度,同时提升了结构的牢固性。湖北省荆门市包山2号墓曾出土一件该型盾。此盾通长46.8厘米,宽34厘米,上部为双弧形,下部为长方形,正面呈凸弧形,背面正中设有木质握把,通体髹黑漆,并以红、棕红、黄、金四色在正、背两面彩绘花纹。

汉朝在继承双弧形方盾的基础上,对盾的形制进行改良。比如,从西汉刘胜墓随葬革盾来看,该时期的盾设有盾

鼻。盾鼻是盾的附件,安装在盾背面把手两端,通过头部外钩盾面的方式增强结构稳定性。在汉军与匈奴的长期征战中,为满足骑兵快速机动的作战需求,便于单手举着抵御攻击的椭圆形盾应运而生。随着冶铁技术普及,铁制兵器得到广泛应用,由此催生出一种将铁盾与铁钩结合的新型复合兵器——钩镰。汉朝时期,军队在实战中不断探索盾的战术运用,通过“剑盾”“刀盾”等长短兵器与盾牌的协同配合,显著提升攻防效能。东汉末年,盾的外形逐渐回归为简洁的长方形。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骑兵人马均披甲上阵,盾的使用减少。这段时期虽是盾发展历史上的低谷,但步盾的形制也有改进和发展。比如,东晋南北朝时期盛行过一种很长的六边形盾,盾面纵向内曲如细柳叶。作战时,士兵不仅可以手持该型盾,还能将其底部尖角插在地上,用棍或长兵器支起成为掩体,使防御的机动性大大增强。这在具装骑兵盛行的年代,在以步兵制衡骑兵的作战中,非常实用。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史说新语

1938年2月,八路军第129师奉命向正太路东段井陘地区进击,以切断日军后方交通,配合正面战场作战。2月22日,第129师在师长刘伯承指挥下,采取“佯攻诱敌、攻点打援”的战术手段,在井陘长生口巧妙设伏,对日军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取得长生口伏击战的胜利。

详细侦察,摸清情况。井陘自古便是天险,是“太行八陉”之一,民间有“过了井陘口,军队放心走”的说法。这里是石家庄通往太原的必经之路,天然的地理条件和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前,八路军第129师组织侦察力量对井陘地区的日军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和活动规律以及周边地形进行了详细侦察。通过侦察得知,井陘城作为日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和指挥中心,有重兵把守。旧关位于井陘西南,是日军设在井(陘)平(定)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日军200余人,并筑有坚固工事。井陘至旧关的公路频繁有日军运输物资与兵力的车辆通过。长生口是井陘至旧关之间的一个交通要塞,是井陘通往旧关的必经之路。早在1937年10月,第129师第386旅就在这里打了一场伏击战,歼灭日军50余人。侦察人员还摸清了日军运输车队的通行时间、路线及日军据点之间的支援响应机制等情况,为复战长生口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支撑。

因敌设案,精心部署。关于作战方案,刘伯承在战前一次全师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是战术的创造者,我们要打击敌人的弱点,不错;可是倘若敌人并没有弱点,即应怎么办呢?答案就是给敌人制造弱点。”当时,井陘和旧关日军倚仗坚固工事,死守据点。表面看来,并没有什么弱点。怎么给敌人制造弱点呢?刘伯承是这样部署的:派兵佯攻旧关,对敌人实施包围,但并不切断敌人的电话线,让他们向井陘的敌人求援,迫使井陘的敌人不得不走出据点,向旧关增援。一旦敌人出了据点,在行进中便造成了弱点。这样一来,连消灭敌人的地点都由刘师长指定好了,就在第386旅初战告捷的地方——长生口。论地形,长生口一带树木稀疏,不利于隐蔽,并非理想的设伏地点。这次将伏击地点选择在长生口,正是抓住了敌人认定我不会在同一地点连续设伏的心理。而且,长生口位于井陘与旧关的中间位置,便于我军分头行动,若敌人人数过多,我军也便于撤退。为弥补不便隐蔽的不足,我军决定在拂晓打响战斗。

随后,第129师作出如下兵力部署:陈锡联指挥第385旅第769团负责佯攻旧关,攻其所必救,迫使井陘日军出兵救援。陈赓率领第386旅主力集结于红土岭、白羊沟一带,以第772团2营作为伏击主力,隐蔽在长生口东北高地,利用地形优势,对日军援兵进行突然袭击;派出1个连赶赴井陘县城南关附近的山地设伏,侦察监视井陘日军动向;第772团主力则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伏击部队或应对突发情况。第771团派出1个连至核桃园与旧关之间,待袭击旧关部队开始攻击时,即同时破坏电线及道路,截击西面来援之敌;派出工兵将井陘以东铁路桥炸毁,阻止由石家庄来援之敌。同时,还安排小股部队在周边地区开展游击活动,迷惑日军,分散其注意力,确保伏击作战的顺利进行。

佯攻旧关,诱敌出援。1938年2月22日1时许,陈赓率突击部队从距伏击地点几十里外的支沙口出发,向设伏地域隐蔽开进。尽管山路崎岖,冷风刺骨,但指战员都“衔枚疾走,勇气百倍”,到达红土岭时,东方尚未发白。拂晓前,各部完成作战部署。

4时许,第769团在确认各支援部队就位、伏击准备就绪的情况下,按照作战计划对旧关日军据点发起佯攻。为给敌人造成错觉,袭击旧关的行动猛烈而迅速,战士们凭借着高昂的斗志和果敢的行动,向旧关日军据点发起一轮又一轮攻击,炮弹、机枪和步枪弹如暴雨般向日军据点倾泻。一时间,枪声、爆炸声此起彼伏,日军据点守军从睡梦中被枪炮声惊

长生口伏击战

■刘云华

醒,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顿时陷入慌乱。在遭受猛烈攻击后,判断八路军意图夺取旧关,于是一边依托坚固碉堡顽抗,一边向井陘日军发出紧急求援信号。

由于第769团在袭击过程中,有意不切断旧关与井陘之间日军的有线通信联络,井陘日军闻讯后,担心旧关失守会影响整个防线,迅速组织200余名日军,在驻井陘南关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率领下,乘坐8辆汽车,沿着井陘至旧关公路疾驰而来,企图解旧关之围。在选择支援旧关的行军路线时,荒井丰吉也曾考虑到日军在长生口吃过八路军的亏,但他坚持认为八路军绝对不会在同一地点重复设伏。再加上想要快速支援旧关,长生口几乎成了必经之路。于是,日军按照刘伯承战前的作战设想一步步踏入八路军的伏击圈。

隐蔽设伏,痛打援敌。在第769团佯攻旧关的同时,第772团2营早已在长生口南山设下埋伏。战士们在寒冷的夜色中潜伏,忍受着恶劣的环境,静静地等待日军援兵的到来。4时许,听见旧关方向传来激烈枪声,得知第769团已向旧关日军发起攻击,战士们顿时有些焦急。

6时左右,日军援兵车队进入伏击圈。随着一声令下,埋伏多时的2营战士们居高临下,抓住日军毫无戒备的有利时机,先敌占领有利位置展开火力,以迅速、坚决、突然的动作对敌发起猛烈攻击。各种火器一齐开火,子弹、手榴弹如雨点般砸向日军车队,首先击毁第1辆日军汽车,致使后面的汽车无法开动。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打得措手不及,瞬间乱作一团,惊恐万分。汽车在公路上连环相撞,有的车辆被击中起火,日军士兵纷纷跳下车,狼狽逃窜。

日军在短暂的混乱后,凭借汽车掩护和有利地形进行抵抗,并以小股兵力向八路军阵地发起反击。八路军战士们依托有利地形,奋勇还击。在激烈的战斗中,我军充分发挥近战优势,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许多战士在刺刀折断后,就用枪托砸、用拳头打,甚至抱住敌人一起滚下山坡。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除少数趁乱逃脱外,大部被我军歼灭。日军仓皇溃逃后,又被我军一直追击至井陘城西。此次战斗成功歼灭日军荒井丰吉少佐以下130余人,炸毁汽车5辆,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步枪50余支及大批武器弹药,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长生口伏击战打破了常规伏击战等待敌军主动进入伏击圈的模式,通过主动创造战机,将敌人从有利地形中引诱出来,实现以逸待劳、各个击破。这一战是八路军机动灵活战术运用的生动体现,是一次教科书般的“攻点打援”经典战例。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陘县吕家村的长生口伏击战指挥部旧址。资料照片